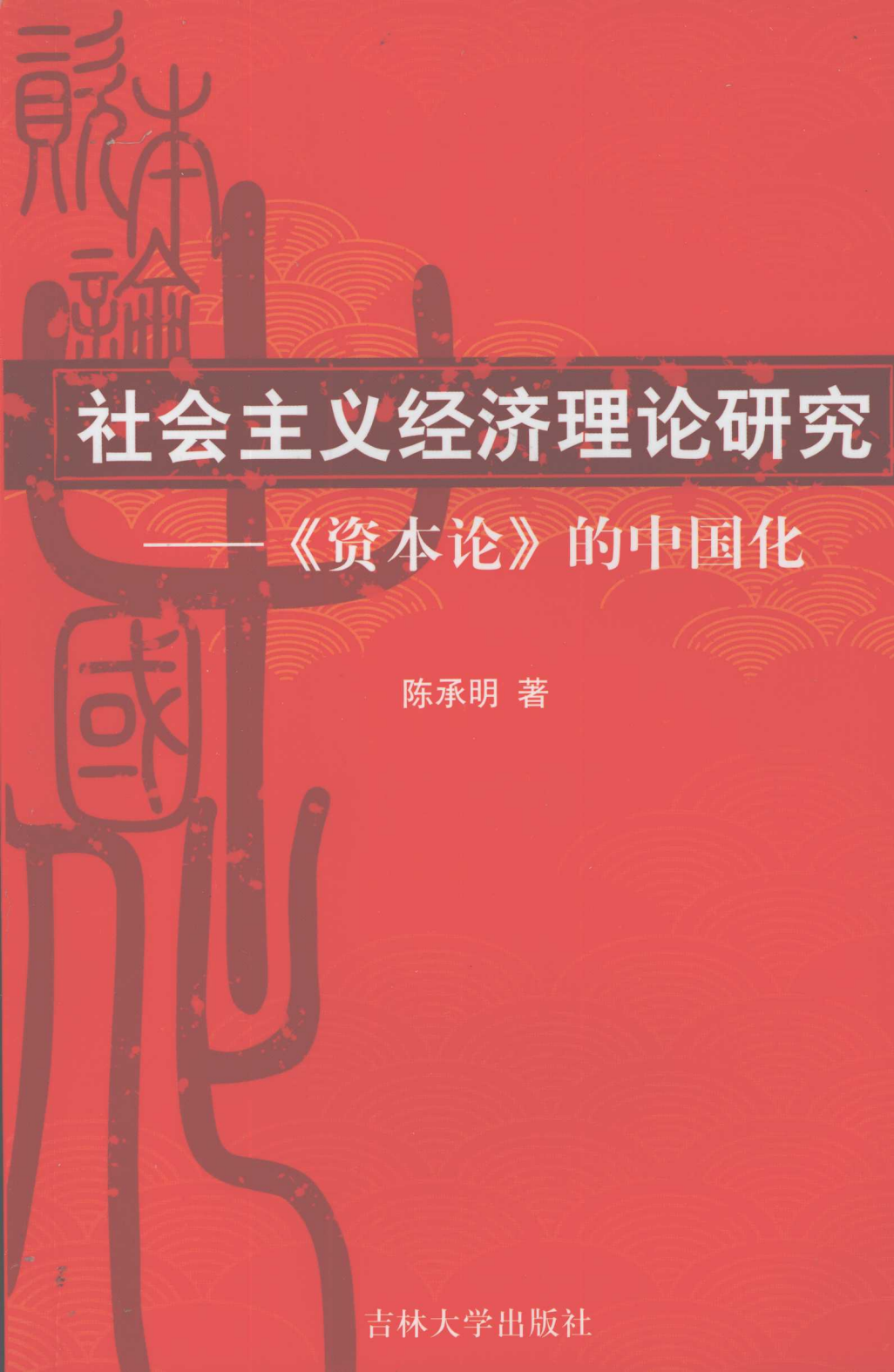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资本论》的中国化

陈承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资本论》的中国化

陈承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资本论》的中国化/陈承明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 -7 -5601 -3646 -2

I. 社… II. 陈… III. 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理论-研究-中国 IV. F1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1042 号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资本论》的中国化

陈承明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张显吉

封面设计 朱 蕊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电话:0431-88499826 邮编:130021

网址: <http://www.jlu.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大1/32

字 数 3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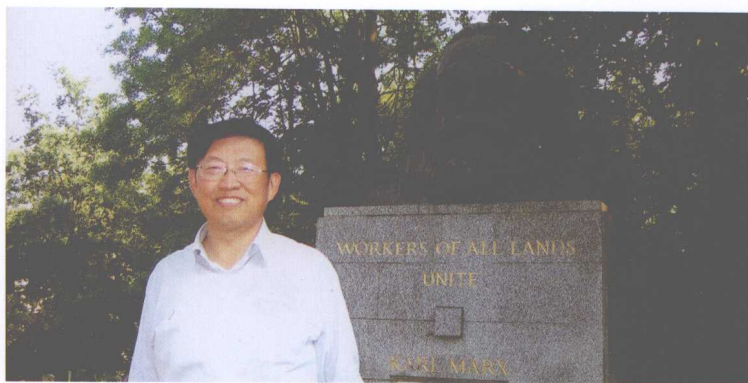
印 张 12.125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3646-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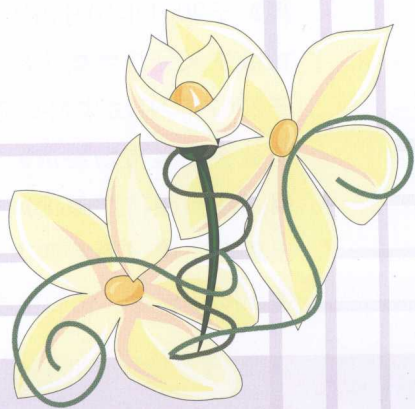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陈承明，男，1950年2月生，江西瑞昌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专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于1997年10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并在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1995—1997年）评选中，获著作类三等奖。专著《唯物辩证的经济思想》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于2000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著《经济的浪潮》于2001年10月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概论》获华东师范大学教材出版基金资助，于2002年7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2003年7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主编《政治经济学通论》于2005年6月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简明西方经济学》于2006年8月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先后发表论文150余篇，并有多篇获奖。

献 给

我的父母、妻子和女儿



序

——我与《资本论》的不解之缘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资本论〉的中国化》一书，是我在高校教学中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汇编。自1985年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起，至今已累计发表了150余篇。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55篇，分类汇编成册。书中的每篇文章都闪烁着我在研究时产生的思想火花，都会使我回想起一段经历和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因此，她是一本用心血和文字记录的“画本”和“相册”。虽然其中并无惊人之作，但凝结着我持续耕耘的艰苦和辛劳，把她们编辑出版不是为了标榜和炫耀，而是对自己成长的回顾和小结，也可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不管这本书有多少缺点和不足，但是她有一个优点和长处，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马克思是无产阶级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世界公认的“千年伟人”。《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和政治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马克思写《资本论》化了将近40年的时间，而我学习和讲解《资本论》也将近40年了。我深切地体会到，《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快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是我们深化经济理论研究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可以说，我的全部成果都是运用《资本论》的科学理论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实际的结晶。马克思的一本“政经”使我一生受益。回顾我的成长经历，确实与《资本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中学时代。记得我在15、16岁的时候，大概是初中2、3年

级,就十分敬仰和崇拜马克思,就有了学习《资本论》的愿望和要求。在课余时间,我曾多次打开《资本论》,试图读懂它,可是常因阅读上的障碍而被迫中断。愿望与能力产生激烈的冲撞,但是每次反复,都使我向前迈进了一步。当我捧着厚厚的《资本论》走上大学讲台时,深深地感受到第一次攻读《资本论》的重要。如果没有初始的朦胧,哪有今朝的清晰?鉴于自己的经历,总想为中学生写一本通俗的经济学读物,使他们免受我初学时的艰难。后来应上海中学唐盛昌校长的邀请,由我和陈绮老师负责编写出版了上海中学的学校教材《经济的浪潮》,也算了却了我的心愿。

第二,工厂生活。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老三届”继续升学的机会,1968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市禽蛋一厂当工人。一直到恢复高考,我在工厂度过了将近十年。此间我也没有间断《资本论》的学习。先是在工厂建立的理论队伍中,组织大家利用业余时间研读《资本论》,记得当时经常为了一句话的理解而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后来,在7·21工人大学里开设了《资本论》的课程,由我担任主讲。虽然我对《资本论》的理解也很肤浅,但是工人们的文化程度更低,我的讲解还是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更有趣的是,当时的娱乐活动比较少,我和爱人在谈恋爱时,约好星期天早晨,带着《资本论》到虹口公园,坐在河旁的长凳上边学边谈。正是在学习《资本论》的过程中使我们的爱情得到升华,因此被人戏称为最有“资本”的一对。虽然许多听我讲课和参与学习的人,包括我的爱人,后来都把《资本论》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却得到了提高。

第三,大学阶段。恢复高考后,我作为首届大学生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当时开设的课程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且有《资本论》的原著。许多同学过去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因此感到学习很困难,我就给他们开讲座、上辅导课,因此得到大家的好评。在不自觉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教学能力,是我后来能够进入高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师的重要原因。多年后,我又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有幸遇到《资本论》研究

的专家、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教授担任我的导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使我对《资本论》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不仅理解了《资本论》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理解了《资本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叙述方式。此间,我还得到复旦大学的蒋学模、蒋家骏、伍柏麟、洪远朋、尹伯成等专家、教授的具体指导。又结识了程恩富、顾钰民、徐惠平、鞠立新、张树安等同窗好友,并得到他们的不少帮助。后来,我对《资本论》研究的深化和论文质量的提高都与此有关。

第四,教学生涯。我从1980年进入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到1998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至今已有27年,一直在高校从事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教学。有些内容使我越讲越熟,有些内容却需要根据现实进行调整和更新。在此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把教学中遇到的难点和疑点,作为科研的重点加以研究和解决;同时,把科研的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和专著,作为新鲜的内容贯穿到教学中去,显著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我的第一本专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就是在教学和科研结合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于1997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并在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1995—1997年)评选中,获著作类三等奖。我的第二本专著《唯物辩证的经济思想——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于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三本专著《〈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教学中与研究生合作完成的,并于2003年由上海的学林出版社出版。此外,我主编的第一本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概论》,获华东师范大学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于200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主编的第二本教材《政治经济学通论》,于2005年由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系本科生的基础理论课教材。以上成果从总体上讲,既是研究《资本论》科学理论的收获,又是运用《资本论》辩证方法的结果。

第五,瞻仰马克思。2005年我和爱人到英国牛津去看望出国多

年的女儿。据说马克思的墓地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公墓里。虽然我们在伦敦逗留的时间很短,但是考虑到我对马克思的崇敬,爱人和女儿还是决定陪我去瞻仰马克思。由于路途较远,加上人地生疏,因而要不断地问路。热情的英国“绅士”不仅耐心地给我们指路,甚至为我们带路,告别时还幽默地说上一句:“见到马克思,别忘了代我向他问好!”可见英国普通百姓的文明程度,以及马克思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初版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可以断言,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若干年后,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精神文明上,都将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使马克思的预言成为现实。幸运的是,当我们赶到公墓时,离闭园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我们匆忙赶到马克思的墓前,向他献花行礼,并用相机留下了这永恒的瞬间。

可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资本论〉的中国化》一书的出版,是我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结下不解之缘的小结,但不是终结,她将鞭策我沿着已有的轨迹,瞄准更高的目标,继续向前迈进。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陈承明

2007年2月12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目 录

目录

序

第一部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继承毛泽东经济思想 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
论邓小平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互关系	(11)
《资本论》为“三个代表”提供理论依据	(18)
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25)
社会主义本质与初级阶段使命	(31)
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3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四大特性	(44)
中国理论经济学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51)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的本源、变异和复归	(59)
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	(66)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74)
论商品拜物教的经济性质和社会意识	(82)
正确认识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87)
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必然联系	(90)
价值规律、价格机制和价格体制的内在联系	(96)
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102)

第三部分 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与发展

论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演变与发展	(109)
劳动价值论对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117)

《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比较	(133)
论管理劳动的价值创造及其分配	(143)
论科技劳动的价值创造及其分配	(154)
论服务劳动的价值创造及其分配	(163)
论发展虚拟经济的必然性	(170)
第四部分 生产力与经济规律	
经济和经济规律	(179)
以提高生产力为核心促进生产发展	(182)
经济效益与生产力的联系	(185)
增强企业活力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188)
产品使用价值与商品使用价值的区别	(192)
“价格”问题两则	(195)
生产力规律、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	(198)
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人才生产力的有机联系	(203)
第五部分 生产关系与深化改革	
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09)
完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217)
完善领导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225)
论企业职工的两层次积极性	(232)
论分配关系及其机制、体制和法制	(239)
按劳分配与劳动力商品的内在联系及其结合	(249)
居民收入分布的偏态格局及其矫正	(260)
正确认识和解决“民工荒”问题	(269)
第六部分 经济与教育的相互关系	
教育与科学文化素质	(278)
论经济与教育的有机联系	(284)
教育是商品吗?	(291)
引进市场机制 发展成教事业	(297)

经济规律与教育规律的相互关系	(304)
企业教育投资及其体制改革	(310)
成教投资改革的设想和建议	(315)
成教科研机构的科学管理	(320)
第七部分 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哲学思想	(324)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关系	(332)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	(337)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机制、体制和法制	(342)
市场经济与反腐倡廉	(348)
促进社区功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355)
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与社会职能	(363)
论贫穷与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	(367)
后 记	(372)

第一部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这部分共有八篇文章,揭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以及与时俱进所导致的理论创新过程。在重点论述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途径和方法。

继承毛泽东经济思想 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毛泽东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毛泽东不仅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卓越功勋。因此,我们在加快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不仅要继承毛泽东的政治文化思想,而且要继承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不仅毛泽东经济理论中的科学内涵,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和挫折,更是我们宝贵的历史借鉴。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自觉遵循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加快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直接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中的经济理论更是紧密联系,逐步深化,不可割裂。因此,毛泽东经济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产物和表现,而且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中经济理论的直接来源,因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①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提出生产力标准,毛泽东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②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并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④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⑤并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⑥,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江泽民进一步把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三个代表”中的第一条,强调了它的决定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和方法。实践表明,由于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才使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快速发展,才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和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

(二)关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

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还是建立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主义,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早在建国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①同时提出,建立国营经济,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中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②这不是自相矛盾,而是辩证思想。我们消灭的是资本主义的整体,恢复的只是它的局部。毛泽东所以能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其原因如下:首先,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出发,看到了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次,认识到个体和私营经济已经发生部分质变,由从属资本主义变成从属社会主义;再次,看到国有和集体经济还不够强大,不仅要有非公经济的补充,而且要与它们竞争才能壮大。毛泽东关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后来邓小平、江泽民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

社会主义要不要继续保留和发展商品经济,也是有争议的问题。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先消灭商品经济,再恢复商品经济的曲折过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针对取消商品生产的主张,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他们“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③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④毛泽东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分析了保留商品生产的条件,他认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①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为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江泽民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前提条件。

(四)关于按比例发展的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与价值增殖规律的作用下,不仅要求单个企业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个别生产力,而且要求合理配置经济资源、促进生产部门按比例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毛泽东虽然没有在理论上认识价值规律的双重积极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意识到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大关系,讲的就是按比例发展问题。例如在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要走自己的道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由于过度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结果导致比例失调。毛泽东认为我们要避免苏联的错误,他指出:要加快发展重工业“就要注重农业和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②科学阐明了农、轻、重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毛泽东还解答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等重大关系问题。后来,邓小平关于沿海与内地经济的交替发展,开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江泽民“三个代表”中关于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人民利益协调一致的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按比例发展思想的继承和深化。因此,重温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经济思想,对于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掌握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

毛泽东十分重视分配问题,因为分配不仅关系到人民生活,而且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有许多精当的论述,比如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处理好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等等。毛泽东在实践中意识到按劳分配的必要性 and 重要性,多次批评了否定按劳分配的思想。在1959年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了“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错误做法。^①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对纠正“左”倾路线的错误起到积极作用。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分配思想,多次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②后来,江泽民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分配理论。

二、毛泽东的经济失误是创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直接动因和历史借鉴

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的失误不仅有主观上的偶然性,更有客观上的必然性。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们借鉴苏联的经验避免了一些挫折,但是苏联的教训毕竟十分有限。因此,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的失误,是邓小平、江泽民创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直接动因,历史的借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统一,因此不论是革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